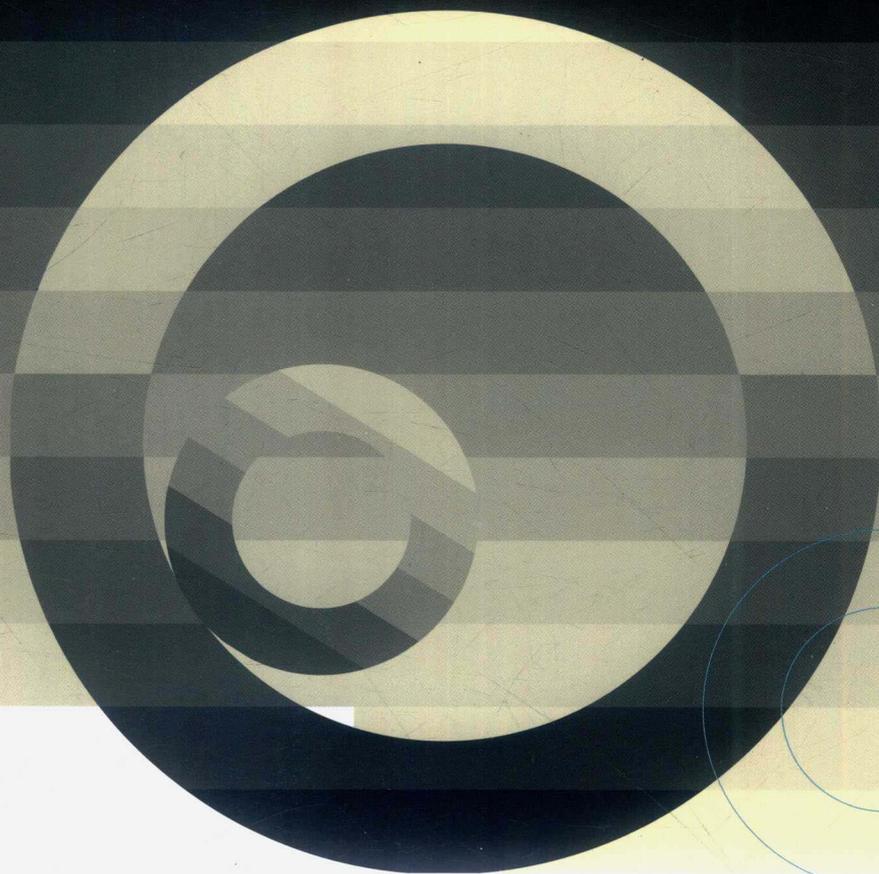


研究生教学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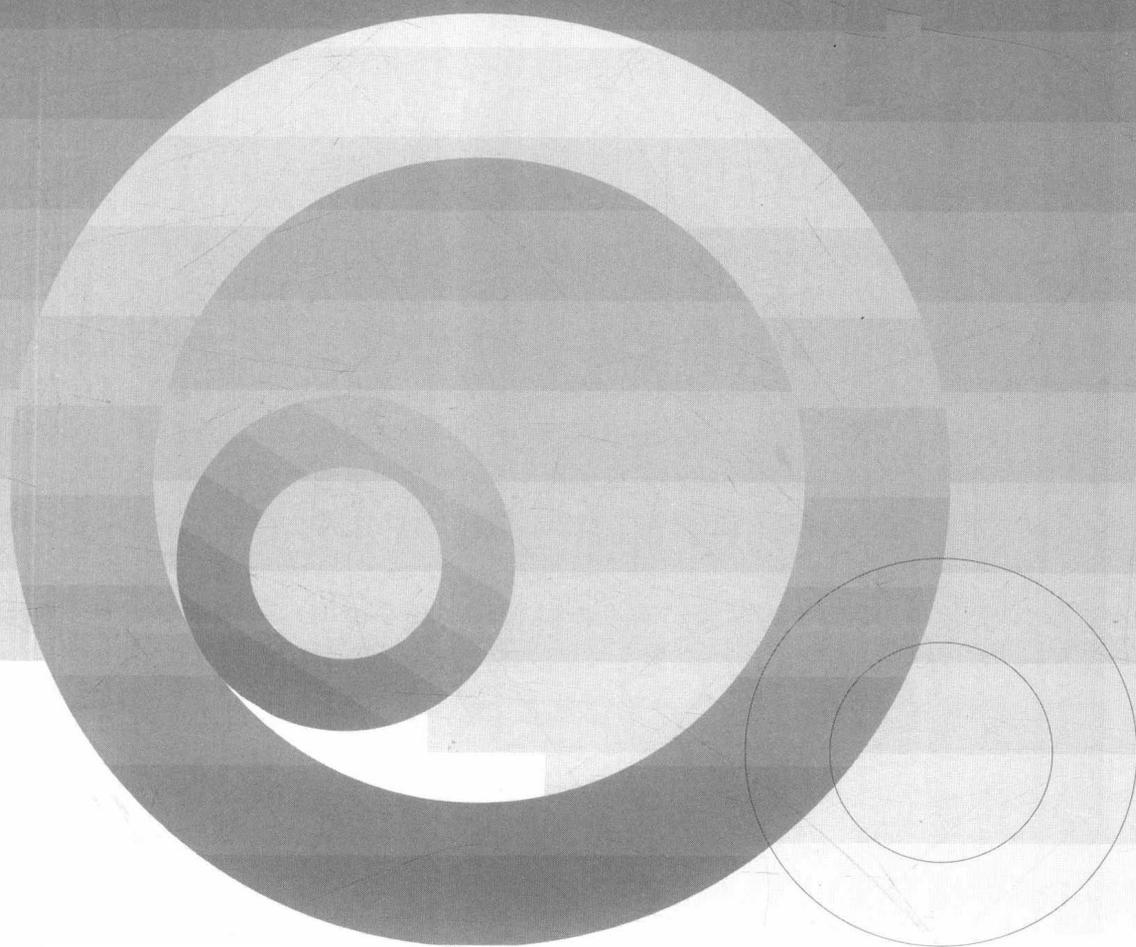
世界经济 基本理论及前沿问题

World
Economics

主 编 周天勇 刘 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研究生教学用书



世界经济 基本理论及前沿问题

主 编 周天勇 刘 东

World
Economic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前沿问题/周天勇，刘东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研究生教学用书
ISBN 978-7-300-24900-1

I. ①世… II. ①周… ②刘… III. ①世界经济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237 号

研究生教学用书

世界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前沿问题

主 编 周天勇 刘 东

Shijie Jingjixue; Jiben Lilun ji Qianyan Went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插页 1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3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与增长、财政体制改革、金融风险控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等。主要学术著作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型》《新发展经济学》《高级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行政体制改革30年》《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繁荣的轮回》《跨越改革的陷阱》等。

刘东，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主任、副教授。曾任中央党校校领导秘书、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拥有政治学学士、金融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经济学博士后经历。现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在省部班、厅局班、中青班、民族班等班次设有课程。在《人民日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中国对外贸易》等报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出版《虚拟资本与投资银行》《从生产劳动到虚拟资本》《公司治理改革通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交织》《中国梦之路》《国际政治经济学十讲》等多部专著。

目 录

导言 一个世界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1
思考题	16
 第一篇 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战争与市场	
第一章 世界经济学的 基础范畴：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	19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内涵	19
第二节 人类公共利益的内涵	23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	26
思考题	29
第二章 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竞争与分配	30
第一节 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竞争：战争与强权方式	30
第二节 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竞争：国际市场方式	33
第三节 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分配：丛林法则与公地悲剧	36
思考题	39
第三章 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协调	40
第一节 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平与发展	40
第二节 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协调的必要性：溢出效应	42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协调的制度保障：国际经济秩序	44
思考题	48
参考文献	48

第二篇 国际经济关系的竞争和博弈

第四章 国家规模经济	53
第一节 国家规模的范畴和含义	53
第二节 国家规模经济的主要内容	55
第三节 国家规模经济能力的国际比较	58
思考题	62
第五章 教育与技术的竞争作用	63
第一节 教育与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63
第二节 教育与国家竞争力	65
第三节 技术与国家竞争力	67
思考题	72
第六章 国际经济的博弈	73
第一节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非合作和合作型博弈	73
第二节 国家间博弈的经典理论	80
第三节 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	83
思考题	87
参考文献	87

第三篇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争论

第七章 自由贸易理论	91
第一节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	91
第二节 新贸易理论	96
第三节 新一新贸易理论	103
思考题	107
第八章 贸易干预主义理论	108
第一节 重商主义	108
第二节 贸易干预与经济发展阶段论	111
第三节 贸易干预在不同经济体的适用性	113
思考题	115
第九章 政策实践	116
第一节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116
第二节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119
第三节 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实践	121
思考题	122
参考文献	123

第四篇 国际 金融

第十章 货币体系	127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	127
第二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主要问题	131
第三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前景	136
思考题	140
第十一章 汇率制度	141
第一节 汇率决定理论	141
第二节 汇率制度的选择	144
第三节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进程	145
思考题	148
第十二章 国际金融监管	149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	149
第二节 金融监管及国际合作	151
第三节 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155
思考题	156
参考文献	156

第五篇 国际 投资

第十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	161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	161
第二节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162
第三节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启示	164
思考题	170
参考文献	171
第十四章 产业转移	172
第一节 产业转移的定义、特点及动因	172
第二节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	177
第三节 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对中国的影响	179
思考题	180
第十五章 跨国公司	181
第一节 跨国公司相关理论	181
第二节 跨国公司的股权和治理结构	183
第三节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实践	187
思考题	188

第六篇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十六章 国际公共产品	191
第一节 国际公共产品基本理论	191
第二节 国际准公共产品基本理论	193
第三节 国际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	195
思考题	199
第十七章 全球治理体系	200
第一节 全球治理发展阶段	200
第二节 国际组织发展现状	202
第三节 当前全球治理的新特点	207
思考题	210
第十八章 全球治理展望	211
第一节 主权国家	211
第二节 主权国家与全球治理的辩证关系	213
第三节 构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理想格局	216
思考题	220
参考文献	220

参考文献

一个世界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2014年，我接受了讲授“世界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前沿问题”一课，在构思讲稿时，我觉得目前现有的一些《国际经济学》《国家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教科书内容较宏观，偏向于纯粹的世界经济理论。在讲课时，我需要将世界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特别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问题）结合起来。因而，我重新选定了一些重要的范畴，布置了内容并设计了一个逻辑框架。最初，这是很不成熟的一个讲稿。后来，我提议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同事们按照这个体系进行撰写，最终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教材。

世界经济学，又称国际经济学，是研究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全球间经济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内在机制、规律和客观变动趋势的经济学分支。我们过去学的课本，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从一个国际经济关系大的格局看，仅以此两部分来了解世界经济关系的全部，似乎过于狭窄。因而，本书试图在世界经济理论框架上做一些创新，从国家经济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展开，到国家利益的贸易和金融实现方式，再到国家间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形成的竞争，最后，为了避免全球性“公地悲剧”，满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国际公共治理体系。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新的尝试。

一、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战争与市场

地球如同一个公共的牧场，而每个民族和国家则像牧场上的牧户家庭。对它们来说，在经济上因各自的资源、人口等禀赋不同，需要交换、分工和协作，衍生出关税、货币和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内容；在政治上要打交道，需要双边和多边协商，需要有外交关系；在安全方面，各自需要防范邻居或者邻居中成员的侵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情报系统；在公共事务方面，需要讨论气候变暖、森林减少等相关的问题，达成共同的行为和秩序；并且，为了处理各自间的公共事务，要进行协商，形成国际经济和政治公共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也在努力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法院等世界政治治理框架。这就是当前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环境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使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完全适应这个国家，反而这个国家的行为要更多地适应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当然，一个国家根据其规模和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发挥的主动性，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但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即使强国，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国际环境来使其适应自己。

不同宗教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合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共处，是影响人类历史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从国际政治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基本范畴、关系是：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生产和分配，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协调和平衡。世界经济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战争获得，还是通过市场贸易和投资等谋取？在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上，是采用丛林法则，还是互助共赢？是导致公地悲剧，还是维护地球家园？

1. 世界经济学的的基本范畴：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能满足一个国家整体需要的有利事宜和状态。全球的土地、领海、森林、淡水、矿产、大气容量等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这些资源面积和数量不均等地分配到各个国家，或者地球的公共领域。不同国家之间有着各自的需要和利益，也存在着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不相一致的方面。

意大利政治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公认的倡导国家利益应为首位的第一位思想家。其观念很快便主宰了欧洲政治，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政治发生了激烈的竞争。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之间可以公然地发动战争。重商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积极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一个经济借口。

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也存在理想主义学派，即根据不同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各自信奉价值观的站队来决定国家间的亲疏和冲突；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则是现实主义学派对外政策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具有多个层面。首先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同样重要的是对财富和经济增长与权利的追求。此外，现代许多国家把保持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也看得非常重要。

研究和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利益和动机—国家行为—在国际上国家（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和风险比较—国际战略关系选择”这样的框架。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要素是人口、国土及其蕴藏的资源禀赋。在古代，部落、民族以及国家之间，除了互为贸易之外，更多的是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强势方向弱势方索贡等方式，分配当时稀缺的人口、土地以及其他资源。也有通过战争只取土地、不要人口的俄国式对外战争和扩张。当然，有时国家利益相对宗教或道德被认为是第二位的——要发起或参与战争，统治者只需要证明开战在宗教或道德上具有充足的合法理由。然而，政治往往是经济关系的反映，战争胜利方的收获，大多是领土、人口、赔款、纳贡等利益。

从近代历史看，随着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大工业化，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财富快速增长，全球海上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但是，国际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是国际市场分

配与战争分配并重，并相互组合。由于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各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为扩张市场、版图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生命的严重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资源、投资、贸易、金融、领土等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态度，如是友好还是不友好，是否会发生军备竞赛和冲突。然而，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冲突，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关系，导致经济关系亲密或者恶化。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是一个综合的、各方面相互影响与互动的关系，不可分割。一方面，经济关系密切，在利益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会抑制国家间激烈的、以武力方式出现的竞争，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对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因此，不论是在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中，还是在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学科中，国家利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家利益，既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利益方面，与外部有关的有人口、资源、发展的环境容量、投资、贸易、货币、产业分工协作等；而在非经济利益方面，包括国际社会地位、政治关系上的协调、文化上的交流、外交上的默契和配合、军事上的合作和裁军等方面。而非经济利益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将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结果，用经济的视角来看待；将非经济问题，用经济的方法去分析。

国家利益，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局部的，也有整体的。比如从时间上看，本币汇率下跌或上升，给国家短期的汇储利益带来的要么是损失，要么是盈余；而科技进步所形成的用之不竭和清洁无污染的能源结构，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远期利益。外援，即对一些国家进行建设帮助，出让一些局部的国家财政利益，是为国家整体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协作等利益而服务。因此，国家利益，需要在短期与长期之间进行平衡，在局部与整体之间进行综合考虑。

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行为的动机，决定于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从人类诞生起，在有记载的这几千年历史中，人类的各部落、种群、民族和国家扩大疆土、增加人口，包括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掠夺人口、侵占资源、强占市场等行为，其动机就是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在制定国家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政策时，最基本的动机是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异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些政治家、学者描述的“国与国之间，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有共同的利益”的状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将国家行为的动机建立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上，只能说是一种幼稚和愚蠢的行为。

科学的国家利益观是国际关系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准则。简单认为某一对外行动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当决策和进行，这是盲目和无依据的。一项行动、一项任务，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而且要评估这项行动的结果：其得到的国家利益是大于国家支付的成本，还是小于国家付出的代价。因此，需要树立国家对外行动的成本观，国家一切对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行为都需要支付成本。一般来说，无论是整个部门还是单个工作人员，在制定行动决策时，都需要对行动的方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等级评估，并进行科学决策。当然，有时需要国家对局部决策进行整体的成本收益评估。如果经济上虽然需要支

付成本，但是从总体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来看，其带来的国家利益是无法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就需要进行综合的平衡和考虑。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对外关系上有一种倾向，即：重意识形态，不重国家利益；重革命外交，轻利益外交；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考虑投入和收益。

对事关国家利益的对外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必须建立一套评估、预算、监督和追责机制。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利益之间，既有共同方面，也有差异的地方，这是国家与部门、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考虑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是科学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分析投入与产出时，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是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政权和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其他方对交往国政治和外交的游说和影响，国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和阶层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左右，等等。往往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关系决策和行动时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对该国未来损益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

2011年利比亚突发政局动荡，对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年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截至3月，已经有26家中资企业价值200多亿美元的项目进入利比亚，主要分布在住房、铁路、石油服务、通信领域。利比亚危机爆发后，除了中兴、华为等民营企业还有部分投资外，中国央企的项目已全部暂停，其中包括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交建、中建材及中国建筑，涉及金额超过90亿美元。利比亚恢复和平后，项目保留下来的不多，新政府对于之前工程的欠款基本不予支付。即使各方同意部分项目的重建，但战乱过后，之前完工项目的价值也难以评估。^①

事实上，战争的爆发往往是由于政治家选举的需要，或者为迎合民粹主义，或者为转移国内矛盾，或者代表军火商、军方的利益，战争决策并不是按照经济等综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出牌，而是内部复杂因素导致的非理性出牌。这也给国际关系带来了不确定的军事冲突和战争风险。因此，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以及应对预案，不能不考虑这些不确定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还有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信息经济学认为，搜寻、获得和整理信息是有成本的，信息对称可节约成本，将减少信息不灵和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在国际关系中，在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为中，信息的对称、灵敏、全面和真实可靠性至关重要。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决策和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双边和多边博弈。而准确的信息，是作出判断、进行决策和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

信息对称的格局取决于：（1）完善和有效的情报机构。从国家利益的大格局看，除了军事情报的专业性外，外交、安全等情报的搜集，其范围不仅是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权安全方面的信息，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产业、资源、贸易、金融、海运、军备、军事部署等许多方面的信息，应当从狭义的小情报转变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大情报。（2）国家外交、财政金融、商务、军事、气候等部门与其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信息沟通，特别是经常性的国家领导之间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非常重要。这样才可以避免由信息错位、战略误判、决策冲动导致的国家间激烈的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军事冲突的发生。（3）应当认

① 侯隽．利比亚易帜各国损失千亿．中国经济周刊，2011-8-30。

真和严格地甄别信息的真实性。一些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通过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等方式传递误导性信息。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方用虚假的信息误导对方对局势进行战略误判，以至发生决策错误，最后致使行动失败。(4) 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选择性地收集、整理和给决策者上报信息。

2. 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丛林法则和互助合作共赢

丛林法则本是指自然界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则和机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家利益竞争中，这种法则也会有内在的调节功能，或者通过战争和强权来扩张和掠取版图、人口和资源，或者通过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来获得国家利益和国际强势地位。

这种全球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方式，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断和反复地造成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联合国宪章》，对于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保护予以了规定；对于随意发动战争侵占他国领土、扩张疆界的行为，也予以了限制。现在虽然也有局部的战争，但人类总体上进入了以市场交易、互相投资、产品和资金流动等为主要方式，各国对全球资源和利益相对和平、公平分配的新时代。

地球空间和资源有限性，与众多国家利益消耗空间和资源的无限性之间形成了矛盾。加勒特·哈丁 (Garrett Hardin) 1968 年在《科学》(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该论文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即“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最后“公有物免费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国家看成是一个个家庭，而将地球看成是公共领域。战争以排他方式获得更多的陆海空资源，就是强国利用武力去消灭或者吞并其他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在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人类社会，火炮、毒气、核武器等会造成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伤亡，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

在世界和平格局和全球市场竞争规则下，每个国家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大气、海洋和外太空领域，又是人类公共的领域，如果各个国家之间不进行协商，则每个国家都想更多地利用和消耗这些公共资源。结果可能是全球温度上升、海洋污染和资源枯竭、外太空领域垃圾成灾，最终可能会使人类生存的地球走向毁灭。而那些沿海海拔较低的岛国，大面积的国土有可能被淹没，甚至整个国家都将沉入海底。

总结一下，地球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但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利益，而对这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无限的。在全球民族和国家关系中，在政治和经济竞争中，丛林法则仍然起着内在的作用，或者以战争的途径，或者以科技和经济等竞争的方式。越是远古，越以战争的手段分配资源；而越是现代，越以市场的方式获得利益。不论何种方式，如果没有世界公共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和约束，都会发生非合作型博弈和公地悲剧。因此，人类既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反对以战争等极端的方式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鼓励以各个国家和民族创新、创造，并以市场竞争和交易的方式去获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进步。然而，不仅战争是丛林法则，市场竞争中也有丛林法则，也有公地的悲剧，需要调节全人类以便实现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可持续、共同发展。

二、国际经济关系的竞争和博弈

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随着民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充满着国家间利益的博弈。

1. 国家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全球经济中，对于国家来讲，也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即国家规模经济。版图大小和人口规模，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规模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竞争力的基础之一，主要包括：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 GDP 总量实力；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形成的世界市场容量；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源规模和素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技竞争能力。

在国际竞争力中，大国经济体比小国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比如，一个有 500 万人口的国家，虽然人均 GDP 高达 10 万美元，但其国力 GDP 总量只有 5 000 亿美元。而一个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人均 GDP 虽然只有 5 000 美元，其国力 GDP 总量却达 50 000 亿美元。从经济基础决定国际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位势来看，人口大国比人口小国处于强势地位。

一个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其内部产业结构比较齐全，发展任何产业都有足够的国内市场消化空间。而一个只有 500 万人口的小国，如果想要发展某一产业，国内市场没有足够的消化容量，想要做强做大就需要借助于国际市场来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

除了产业发展与市场外，人口和版图大国在创新、创业、储蓄、资源动员、发展空间等各方面都颇具优势。实际上，国家竞争力是人口规模、版图、自然资源、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函数。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国际社会中长久地保持其竞争力，维持人口规模在全球总人口规模中的比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总规模的比例持续下降，假如从 20% 下降到 5%，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将处于一个长期衰败的过程，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经济及国运的长期下行。

2. 教育与技术的竞争作用

各国的经济，如果没有教育和技术进步，资本和一般劳动等要素收益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长期下降，经济增长最终将达到一个极限而停止。而教育以及以教育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资本收益率。因此，国家间的竞争、教育和技术的差异是关键方面。引起一国转折和爆发性发展，并获得国家投资和贸易优势的，往往是国内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市场化和产业化，即产业创新和革命。

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国际竞争力又反映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之中。国际贸易和投资竞争力提升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国内人力资本（教育）、科技投入、科技存量、科技转化能力；另外一种是国内资源，本国可以从技术领先国吸收或模仿相关技术。当一国科技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缩小，其国际贸易和投资竞争力就增强；反之，就会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竞争力下降。

3. 国际经济：非合作型和合作型博弈

非合作型博弈：国际社会自由竞争的行为和法则。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自由市场竞争的法则为优胜劣汰，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人类、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得到进

步。从自由竞争讲，国际关系也遵从竞争的丛林法则，即国家间的弱肉强食，博弈中的物竞天择，冲突中的你死我活，民族中的适者生存。

国际关系中的非合作型博弈，表现为相关参与者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是一种具有互不相容特点的情形。国家间非合作型博弈策略，研究的是相关国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性地作出决策使自己国家单方面的收益最大。

国际关系中非合作型博弈中的零和博弈，是参与国家间博弈的各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在严格竞争下，一个国家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博弈各国家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方面吃掉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国家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比如，一个国家在版图和人口上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就是零和博弈。^①

然而，在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负和博弈。其指竞争国家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所得小于所失，也就是其结果的总和为负数，是国际关系中一种两败俱伤的博弈，结果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② 在现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治理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包括侵占部分领土的行为，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约。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大多数表现在领土纠纷、贸易摩擦、产业竞争、金融货币、科技进步等方面。因此，国家间在这些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一般来说，并不表现为零和博弈，许多情况下表现为负和博弈。

在非合作型博弈中，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非常规型战争。在常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形成非合作型博弈，当冲突激烈时，会爆发武力相向的战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在非合作型博弈的格局下，也会有非常规型战争，如货币、贸易、生物、信息、经济制裁等战争，旨在摧毁对方的货币体系，获得巨额的贸易收益，造成对方的生态和健康灾难，破坏对方的信息网络系统，打击对方的进出口和资源供需，等等。

在现代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型博弈有四个重要的经济学原因：非合作型博弈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评估，以及在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中的相机选择；各个国家利益需求与全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各个国家利益消耗公共领域的无限性与公共容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世界价值观、国际集体利益主义与国家个体利益主义的平衡。

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型博弈，是指相关国家间达成对各方行为具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也被称为正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型博弈，实际上是参与国各自在博弈过程中的妥协。双方或多方合作型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剩余在各国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博弈国家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因此，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国家间合作型博弈的基础是信息沟通、协议约束和执行程度。国家间合作型博弈与非合作型博弈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的信息互通和存在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契约。国家间的信息互通是形成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能够促使具有双边和多边共同利益的单个国家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结成双边和多边联盟。然而，联盟能否获得净

^{①②} 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原理参见张维迎所著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1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收益以及如何在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分配净收益，需要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来保证。比如，现存的国家间双边或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自由贸易合作区，就是有约束力的、能使参与国家都增加利益的合作型博弈案例。

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社会和国家博弈中，协议或契约可能是部分可强制执行的，而另一部分不能强制执行。一些国家可达成契约，另一些国家却不能够达成契约。在实施过程中，其中有若干部分可执行，其余的部分则不可执行。于是，实际生活中的国家间博弈，大多处于合作型博弈与非合作型博弈之间的相机选择。^①

可以看出，在世界大家庭中，国家有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版图资源等方面的大小之别。一个国家从国家竞争力看，人口规模是基础，经济总量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产业实力的综合反映；而版图面积和资源多少，则是其竞争力的条件。然而，技术先进的以色列由于人口规模和版图面积太小而不可能是有竞争力的大国，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也不可能是强盛之国；版图面积不太大的日本则因技术和产业实力较强而成为有竞争力的国家，版图很大的加拿大又因人口太少而不可能是经济又大又强的国度。

由此可见，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强国，需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版图面积。在此基础上，需要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素质，积累最宝贵的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最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具有整体竞争力的基础和根本。

而从人类社会看，竞争就是各民族和国家间的非合作或者合作型博弈。非合作型博弈导致双方或者多方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在实际的国家关系中，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合作型博弈。然而，各个民族和国家，往往是在合作型博弈和非合作型博弈之间，进行纵向各阶段间、横向各事务间的相机组合。

三、贸易、投资和金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利益不再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国家间贸易、投资、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金融交流来实现。在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方面，有两派观点：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

（一）贸易理论及其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经济和现实国际关系中较为奇怪的是，主张经济贸易自由价值观的国家，可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信奉国家管制价值观的国家，往往指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现在更是过犹不及。

1. 自由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分别提出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分工和相互间自由贸易的理论。而20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 1879—1959）和其学生俄林（Ohlin, 1899—1979）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国家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即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上有不同的条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

^① 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原理参见熊义杰所著的《现代博弈论基础》（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就不相同，生产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应输出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该国资源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输入在生产中需要较少的该国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之便，扬长避短。

上述理论的基点，即国家间自由贸易，会使交易的国家都获得利益，并会使全球的产出最大化。

2. 贸易干预主义理论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观点，最早的国际贸易干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 1571—1641）。他认为，应当发展国内工业，视金银为财富，应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出口而管制进口，减少金银流出。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List, 1789—1846）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在初期发展的第一阶段，可以实行自由贸易，以换取外汇，建立自己的工业；在工业成长的第二阶段，需要国家进行贸易保护，使国内自己的工业免受竞争，成长起来；在发展到与先进国家同一水平后的第三阶段，竞争基础一样，可以实施贸易自由化。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 1901—1986）则提出“中心—外围”学说。即发达国家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发展中国家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低价出口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则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加工级的产品，价格高、附加值大。这实际上是国家间的剥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且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

3. 与理论相反的政策实践

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讲，贸易政策与各国的工业化战略密切相关。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而实行贸易自由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则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拟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制成品，以最终摆脱在工业制成品进口方面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自力更生实现民族独立的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有：进口限额、外汇管制、汇率高估、贸易高关税等。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一些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失败和停滞，迫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转而采取“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出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通过促进消费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出口，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深加工发展原材料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来替代传统的初级农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由此来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贸易政策上看，实行与进口替代战略相反的措施，如放宽进口配额、降低关税、货币贬值、放松汇率管制等，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

从结果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区，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大陆，都得到了成功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东亚发展奇迹。而曾经信奉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发展很不理想。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